

刘

LIU

东

DONG

自

刘 东 著

跨

世

纪

选

学

人

文

存

集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跨世纪学人文存

刘东

自选集

刘东 著

“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跨世纪学人文存
刘 东自选集
刘 东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541001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36 号)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889×1194 1/24 印张:11 插页:2 字数:254 千字

1997 年 9 月第一版

1997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3500 册

ISBN 7-5633-2483-6/B·051

定价:(平)21.00 元
(精)29.00 元

出版说明

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学人。学术所依托者，学人也。学人须由学殖养成，非纯由天资铸就。学殖者渐，天资者顿，而学术的规律是“渐”的。基于这个“渐”的规律，出版人便有义务在当代学术的积累与整理上做一份工作，以助成学术之进步。这是我们出版此丛书的初衷。

新时期（20 世纪 70 年代末开始）以来，中国学术界涌现出一批新学人。他们大多有过对社会动乱与变革的体察，受过“西风”渐欲迷人眼的种种思潮的冲激，有过放眼望洋的踟蹰，亦有过躲进小楼的沉潜。他们在 80 年代初崭露头角，继而渐趋成熟。90 年代以来，这批学人更以一种成熟的心态，对新世纪的学术前景作了从容的思考。由此我们也就有理由期望他们在步入下一个世纪的时候，成为新世纪通博的学术大家。这样的大家是现代化中国所迫切需要的。因为一个民族，在其步入现代化的时候，尚不能对自身存在作出健全、合理的解释与肯定，那便是崩溃的开始。学人的使命，究其根本正在于作出这样的解释与肯定。我们不能在拥有了技术之后却失去了精神。这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是可堪忧心的问题。

《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中国这一批新学人，多是这样的“心忧”之人，当其激切之初，曾踟蹰

于良知的煎迫；当其冷静之余，又沉潜于学理的涵泳。这样的“心忧”，是学界的好传统，也是中国学人最可宝贵的品质。他们的学术自选集、也许不一定能呈示其学术全貌，但肯定能够突出体现其宝贵的学术品质。我们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希望这样的品质能够在 21 世纪的中国学人身上传承下去。

“跨世纪”只是一个象征的说法，并不是说未被列入“跨世纪”的人就无权迈进下世纪的门槛。“跨世纪”只是意味着，我们对新世纪中国文化的昌明与辉煌有着多么热切的期许，以及基于这热切期许而履行的对中国文化建设重任的自觉的肩负。没有这样的自觉，便没有迎接新世纪的真正准备，也就没有了开创未来的现实基础。丛书收入的，都是人文科学研究者的著述，我们想：人类存在的价值，其终极尤须以人文的尺度来衡估。

90 年代的沉潜，也许意味着中国学术界已进入了一个转型期，这样的转型是承前、也是启后。在这个重要的时期，我们出版这套“跨世纪学人文存”，旨在尽我们的薄力，倡学术之昌明。

是为说明。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九七年九月

自序

学术界也自有它圈子中的客套话，比如一照面总免不了要彼此问：“最近都在搞点儿什么？”这其实本也跟外国人习惯在见面时道声“How do you do”一样，表达的意思只在于寒暄“你好”，并未真的打算调查你私下里的行为，甚至也并未见得表现出多少对你的特殊关心。可我每碰到这种场合，却总会十分尴尬，觉得根本无言以对，——盖因自己这辈子根本就不能算是“搞过什么”！

有的朋友知道我读书读得太“心野”了，所以对我这种“谈不上搞过什么”的窘境，便往往会解嘲似地雅谑一句：“问你就得问‘焉不学’罢？”但这种说法却更使我芒刺在背，因为它显然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所谓“通儒”，而藐予小子岂敢？其二则只是所谓“杂家”，这又令我有几分于心未甘。

其实我原也是并不难为自己觅一块“立锥之地”的：既然从大学到研究生院念的都是哲学系，我本来就蛮可以像其他同窗那样，对此类问题应对如流，比如“正在搞中哲史或西哲史、伦理学或美学、胡塞尔或维特根斯坦之类”。可打从我识得学问为何物的头一天起，就压根儿没有打算过这样来回答问题，因为我以为任何一位哲学从业者的天职，都只应是“思想”本身，而一旦把自己的目光局限在“想哪路问题”或“想谁人之想”上面，便终究要落到第二义去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搞什么”这类问题，真是不易敷衍。你要是对人

家讲自己眼下碰巧在“想什么”，便失之于太实，一副井底之蛙的蠢态；而你要是人家讲自己实不过是“一直在想”，却又失之于太空，竟显得有些故弄玄虚。

而且，更难用三言两语就跟别人厮混清楚的，还在于你的心向到底何在，因为即使同行们都把哲学的安身立命之地认定为“哲思”本身，也未见得就能在运思方向上求得认同。比如，李泽厚一向把哲学的使命看作“后知”，或者如黑格尔所说的那种黄昏后才起飞的“密纳发的猫头鹰”，由此他少不得就要去营造自己的“人类学本体论”，循历史主义的逻辑去描述康德或孔子笔下的人性结构是怎样在实践中发生出来的；而我本人却更愿把哲学的使命看作“先知”，或者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的那种处于新旧世纪之交的思虑着下一步文明进径的“圣哲”，由此我就势必要把“文化哲学”的问题看得惟此为大，一心要从现实困境中把身后的历史拉到“善恶的彼岸”去……所以想想看罢：就连对“到底该朝哪儿想”这样基本的问题，大家都争不出个结果来，那么在这种人言言殊、人思思殊的情况下，别人又凭什么把深思熟虑和疯言疯语区分开呢？

再说我自度也恐非充当“先知”的材料，——那一定是非“生而知之者”不办的伟业宏图罢？而见笑的很，我实际上只是到了尼采笔下的查拉图斯特拉决计远离红尘归隐山林的年龄，才刚刚试探着思考一些人世间的问题；眼下虽已不觉又到了他走下山岗告喻真理的岁数，却仍自觉得思力远不敷用。查拉图斯特拉才不愧是一位真正的先知呢，他居然能自信地说：“看啊！我厌足了智慧，如采取了过多的蜜的蜜蜂，我需要向我求索之手。”可相形之下，尽管自己也同样认识到了“先知”对于人类生活的重要性，却根本并不具备如此丰饶的智慧，而简直就像哪位画家笔下的盲丐一样，徒然向四周空举着饥渴的求告之手……

正因乎此，用不着像苏格拉底那样去故作谦词，我也诚心诚意地知道，自己委实离“一无所知”相去得并不很远。对于自己过去如“飞鸿踏雪泥”一般留下的手迹，我向无自信之心和自珍之情。有些文稿在南撤北迁时被信手烧掉了，又有些文稿被拿去发表的杂志社给糊里糊涂地弄丢了，我都觉得这很平常，根本就值不得为之呼天抢地。至少迄今为止，写作之于我，仍只是练习思想和整理思想的一种手段，就像我在琴房里唱过的那些练声曲一样，绝无登台表演的意思。若跟那些供奉于

书房四壁的先贤大哲相比——说真的，我认识的死者可比活人多得多，这使我无法不战战兢兢如临如履——我那些信笔涂鸦式的“作品”究竟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然，这也许并不意味着，那些习作即使对我个人来说也毫无意义。我向来认为，可以把写作活动区分为完全南辕北辙的两类。有的时候，它对作者而言仅仅意味着“付出”，也就是说，由于在下笔之初就未曾意识到自身的心智局限，而只想“竹筒倒豆子”般地把一种现成在手的真理付诸纸面，所以有些人在文章杀青之后反而会茫然失措，脑筋像泡久了的茶叶一样淡而乏味，充其量也只会“不抄别人专抄自己”而已。不过，在另一些情况下，写作活动却也可能意味着“获得”，也就是说，由于从一开始想要征服的就并非任何外在的东西，而只是自身精神视野的界限，所以对于某些试笔者来说，真正重要的就并非“曾经想过什么”，而惟在于“曾经想过”！那些思想的练习簿，无非是一件件穿得破旧和狭小了的衣服，而从它们中间挣脱出来的，则是作者逐渐成长起来的精神高度。诚恳地说一句，不管自己的写作活动究竟能否算得上是走着后一条道路，但我总还是对它心向往之的。因此，我至少还能对过去写过的东西抱这样的坦然态度：设若其中还能显示出一得之愚，那也只能算我撞上了大运；而即使它们根本就一无是处，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自己今后还有余力朝更正确的地方运思就行了。——无论如何，我是绝不会白费劲儿去为自己偶尔的失言辩解的，因为我已经痛切和同情地看到过，这种死命替自己“圆谎”的可怕情结，徒然耗费了许多作者的主要精力！

正因为这样，如果不是迫于出版社编辑和学术界诤友（特别是陈来兄）的再三催促，我还真觉不出过去的这些思想作业竟有再发表一遍的必要。而可叹的是，现在既已硬着头皮从匣中拣选了一些文稿装订成册，也就确实再无任何“藏拙”的可能了。我只有斗胆把鉴定它们的工作拜托给读者；而且，既然任何难以克服的外在原因都不足以替这本书的种种阙失辩护，所以我唯一敢于请大家海涵的也就只能是——鉴于写作时间的较大跨度以及作者在此期间的心气变异，也鉴于论述主题的随机漂移、以及各种文体的不同要求，这本《自选集》无论从什么角度讲，都终究会显得有点儿杂乱无章。因之，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老话：如果

此书尚可以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核心线索的话，那并不在于我曾经“想了什么”，甚至也并不在于我曾经“怎样去想”，而惟在于我确曾不断地“学着思想”、确曾努力试图突破自己心胸的局限，以便既能弥补自己在学识上的缺陷，又能锻炼自己更简捷或更细致地处理某些难题的能力。

那么，究竟能否在此立下一纸“军令状”，保证自己起码在今后还能在学业上有所寸进，以至于终能替江东父老想透一些难题呢？若搁在“早岁哪知世事艰”的过去，我肯定是不怕在这方面慷慨陈辞的，可眼下，竟连讲这类大话的胆气也没有了。有人曾经说过，古今学人凡能成大器者，莫不需先在“才、学、思”这三种素质上获得均衡的发展；我一向引此语为知言，并把它当成治学的座右铭。但也正因乎此，细细思量一番，我又不免对自己生出满肚子的狐疑来：既然所谓“才”乃是指先天的禀赋，绝非靠后天的努力便可凭人力企及的，那么自己今后果能指望的，也无非就只是在“学”和“思”的循环中积累跬步，以图解开一个个“罔”或“殆”的思想死结了罢？所以，若论本心，我总还是希望自己在今后能继续“学着思想”，以便把其他问题处理得稍稍像点儿样子的；但与此同时我又清醒地意识到了，今生今世能否真的做到这一点，终归还是须“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毫无疑问，此种说法绝不足以用来推诿任何一个主体都必须向历史承负的伦理责任；不过，读者倘能念及夫子所谓“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的名言，而对作者目前这种“无可如何”的困境有所谅解，或可助我略解内热也。

目 录

自序·····	(1)
回到轴心时代·····	(1)
不通家法·····	(6)
形式合理化只是必要条件和最低标准·····	(12)
西方的丑学·····	(17)
叔本华:没有意志的意志哲学家 ·····	(42)
“现实主义”可能吗? ·····	(67)
艺术究竟是怎样流变的 ——述评《艺术与人文科学——贡布里希文选》·····	(81)
试论中国文化类型的形成·····	(103)
中国古代饮酒文化·····	(183)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	(190)
北大学统与五四传统 ——历史的另一种可能性·····	(199)
中国能否走通“东亚道路”? ·····	(211)

多元标准下的“进步”概念	
——在中德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要·····	(228)
“创造性转化”的范围与限制·····	(236)
文化观的钟摆·····	(242)
主要著述一览表·····	(250)

CONTENTS

Preface	(1)
Back to Axial Period	(1)
What's Wrong with "Jia Fa"?	(6)
Formalization Is Only the Essential Condition and the lowest Standard	(12)
The Western Subject of Ugly	(17)
Schopenhauer; the Will-Philosopher Without Willpower	(42)
Is the Realism Possible?	(67)
How Does the Art Transform? A Commentary to The Selections of E. H. Gombrich	(81)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Pattern of Chinese Culture	(103)
Drinking Culture in Ancient China	(183)
Physical Culture in Ancient China	(190)
Learning Tradition of Beijing University and Spirit Tradition in May Fourth Movement The Other Possibilit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99)
Is the "East Asian Model" Applicable for China?	(211)

The Idea of Progress under the Standard of Pluralism	
A Speech Summary at Sino-Germany Academic Workshop	
.....	(228)
The limits of Paradigm of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236)
The Pendulum of Conception of Culture	 (242)
Catalogue of Main Wroks	 (250)

回到轴心时代

再没有别的什么话题，会比此书的题目更让中国人长久而普遍地动感情了。自从英国武装贩毒集团摧枯拉朽地打破国门以后，这个既好像已经离开人们远去，又好像无时不在包围着人们的古老文明，就一直被朦胧地认定与各种切肤之痛直接或间接相关。于是，即使是了解传统不多的人，也总是毫不犹豫地对这个本来是最需要学术根基的课题大发议论。他们要么将自己介身其中的困境归咎于传统，要么将之归咎于传统的丧失，因而要么宣称过去的历史错了，要么针锋相对地宣称对过去历史的中断才错了。

而在另一方面，以研究传统文化为业的专门家们，对于门外汉们老是把架吵到自己的领地来，又常常怀有天然的反感。他们或许会善意地为此再开出一份更详尽的“国学基本书目”来，却很少会转念承认：即使是就这个热门话题所发表的最外行的看法，也照样有其积极意义，并非仅仅在为学术界添乱。他们似乎没有领悟到：当人们试图回答“传统是什么”的时候，骨子里都是想要说清“现实不应是什么”；而一当思想借此被提升到“应该如何”的层面上，高出现实的理想参照系就必然随之萌生，种种纷争不已的歧见也就悄然统一到对人生价值的呼唤上来了。正因为这样，对于那些自以为掌握了在这方面的发言特权的人，就有必要提醒一句：即使从专业的角度来挑剔，那些在往返论辩中各走极端的意见是犯了所有可能犯的错误，它们也仍然正确地共有着对文化

环境的现实危机感；而且，如果没有被醉心于细节考证的学者所遗忘的话，这种危机感才应是他们检省和整理传统的主要动因。在这个意义上，也许有点儿令那些醉心细部以逞一技之能的专家们难堪的是，长期以来，正因为议论传统文化的人远不限于他们狭小的圈子，人们才没有沉湎于仅仅去“玩”文化，在这方面形成的“热点”也才会支撑起民众心理中一个普遍存在的超越支点；尽管由此所反映出来的对于现存状态的批判意识是模糊不清的，但毕竟时时矫正着只把对传统的考索当成一个纯粹技术过程的意义迷失现象，因为它暴露了日常世界的无根与失范，从而凸显了让生活重获价值的终极关切。

当然，问题并不到此为止。经由对社会的精神分析而诊断出对传统的误读乃深源于对现实的强烈不安和超越企望，这只能证明人们的生命本能躁动的真实性，却不能证明由之升华出的梦呓也同样真实。因此，渴望在过去与未来之间为自己找到确切定位的现代中国人，就没有理由满足于依赖随意的联想来补充自己对传统的一知半解。须知，历史文本中所埋藏的答案，决不仅限于人们已经失去了什么，还更包含他们将可能得到什么；因为尽管人们可以凭空虚构出千百种未来生活的前景，但到头来真能为历史选中的，却唯有能从已化为下意识生活态度的共通文化心理中自然引伸出来的那一种。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置身在历史延续性之中的人们来说，要想创造传统，就必须先有效地激活传统，而要想激活传统，又必须先全面地认识传统。如果人们看不到，这种确乎有限的历史主动性恰恰又是他们唯一现实的历史可能性，那么，他们尽可以跳出方外指手画脚地说中国缺这少那，但就是说不清中国可以得到什么，无力把握住这个民族真正的生存机会。缘此，又必须同样公正地讲，只要人们还仅仅热衷于抓住传统文明系统的这个或者那个片断，去以偏概全地进行水火不容的褒贬，他们就只不过是喋喋不休地重复着摆脱现实困境的要求，而并没有朝着问题的解决跨出哪怕一小步。

正是基于上述判断，产生了有关本书的基本构想——既然一般读者在没有可能倾毕生精力去涵泳其间的情况下又总要表明对传统的态度，而专家们又往往囿于现代学术的分工而不得不偏守可以“安身立命”的一隅，那么，为两方面计，都有必要系统地拟出涉及到所有重要关

节点的题目,约请各方面的专家,在一个不太难卒读的篇幅内通力描绘出中华文明的全景。在目前尚未对传统进行大规模“年鉴学派”式的研究的情况下,这起码暂时是唯一可行的替代办法,因为尽管这仍嫌不能清晰地勾勒出一个文明系统的内在构成关系,毕竟已经足以使读者们只要一册在手,便不致再对传统文化的各个环节顾此失彼,只能借题发挥出自己的主观取向了。当然,为了趋向这种认识上的客观和全面,本书的写作态度首先就应是严守价值中立的;它的全体作者从一开始就被明确要求了这一点。大家清醒地意识到,在一个和别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密切相关的问题上,任何人都不可能也不应该仅仅靠自己的知识优势就越俎代庖地下判断。不过,如果读者们不是把本书冷落成站在案头上备查的工具书,而是把它当作一整本必须从头念起的对于传统文本的全面导读,它就仍然有可能向人们提供一个陟罚臧否前的全方位知识背景,以免他们把神圣的独立思考权利运用得过于草率和不负责任。这是因为,只要人们能够系统地读完本书的八十一篇有机相联的文章,他们就一定会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惊讶地发现:原来在自己明确赞赏(或者弃绝)传统文化的某些要素的同时,竟又不自觉地在对它的另一些要素进行悄悄地抵触(或者保留)。由此,就算论辩对手的立场仍是从情感上难以接受的,却也会变得在理智上容易理解了。

这样一来,每一位读者的心情都会变得踌躇和沉重起来,决不会再像过去只抓住传统的东鳞西爪时那样,可以匆忙和率性地对它要么全称肯定,要么全称否定。沿着本书并列出的众多文化因子的辐射与相通,人们有可能逐渐体悟到作为其无形经纬的精神网络,从而确信存在着一个其意义大于各部分之总和的整体文化背景。准此,他们又必然会发现,在一个发育得如此圆熟的文明系统中,尽管其各个构成因素对后人可能显现出截然相反的正面或负面涵义,但在前人那里都同样具备着服务于总体结构的功能,也同样渗透着具有内在整一性的传统价值观念。设若认识上升到了这一步,那么,在本书所横向展现的古代生活的全盛总貌面前,过去那种亦步亦趋于各种外在的偶变,而把一部中华文明史归结为其必然颓败史的虚假历史主义逻辑,就显然只属于对经验事实的盲目崇拜了。对于读者们来说,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已经通过宏观的鸟瞰而认识到——让自己觉得可爱或可恨的两种东西在古代传

统中是缠在一起的，而在于通过微观的解码而认识到——这两种东西其实是服从于一种深层价值追求的，因而说到底又只是一种东西；故此，除非人们已经找到充足的理由来全盘否定古代文明的价值内核，否则，从另一种精神传统中派生出来的对于中国精神传统的总体拒绝，就很难被相信是纯粹出于理性的选择。

不过，认识到历史在其有限的展开中是会犯错误的，绝不意味着人们从此就有理由去厌恶和逃避历史；恰恰相反，正是为了让历史的现象向着理性上升和靠拢，人们就更应该积极地投身于修正和创造历史。此念一生，对于过去的充满悲切的追悔，顿时化作了对于未来的满怀激情的瞻望；而中华文明在过去一个半世纪间的逐渐解体，也就从压在中国人身上的无可奈何的宿命，变成了赋予他们巨大选择可能的契机。历史阵痛最剧烈的时代，往往也正是历史惰性最小的时代。纵观孔子、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和耶稣之后的全部世界史，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的哪个民族，会像近现代中国人这样苦难深重地游离于各种既成的文化秩序之外；但也正因为这样，也就再没有谁会比他们更容易从心情上接近敞开着最大创造机会的新的“轴心时代”。为了不辜负这样千载难逢的反本开新的历史良机，或者更干脆一点儿说，为了不白遭这一场大罪，当代中国的真正主题，就既不在于像某些人提倡的那样，使中国文化逐渐从实质上变种为西方文化的走了样的“亚文化”，也不在于像台湾等地的做法那样，把中国传统精神中的某些本质侧面降格为现代化起飞时的工具性经济伦理，而在于平心静气地参考着中国、西方及其他文明历程的全部正反经验，敏感着已经对全人类构成巨大挑战的所有当代问题，去比较和检讨过去那几个伟大先知的一切长短得失，借此思想出融汇了东西文明之优点的更正确的价值理念，并把它有效地注入正待激活的中国传统之中。只有在成功地进行了这种文化改变之后，中华文明才能够获得比迄今为止的所有文明都更长久的内在文化动力，而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的中国历史才能不被讥讽为一场持续不断的错误；也只有这样，中国人才不致老是被按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西方中心主义逻辑教训说：你们的今天正是别人的昨天，而你们的明天又是别人的今天。

历史从来都是依赖着对它的不断创造性阅读而保持其富有突破活